

老局长档案

上海市闵行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编著

上海三联书店



老局长档案

上海市闵行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编著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局长档案 / 上海市闵行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编
著. —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9.3

ISBN 978-7-5426-6618-5

I. ①老… II. ①上… III. ①群众文化—文化工作—
上海 IV. ①G249.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28214号

老局长档案

编 著 / 上海市闵行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

主 编 / 杨继桢

执行副主编 / 吴玉林 俞 慧

特约编辑 / 赵 韵 姚 尧 樊惠安

责任编辑 / 姚望星

封面设计 / 周霭萍

监 制 / 姚 军

策 划 / 《城市季风》编辑部

设计视觉 / 明镜文化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30) 中国上海市漕溪北路331号A座6楼

邮购电话 / 021-22895540

印 刷 /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9年3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787x1092 1/16

字 数 / 180千字

印 张 / 12.7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6618-5/G · 1520

定 价 / 58.00

敬启读者,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010-84721811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序

编辑《老局长档案》一书，最初的构想还得从五年前说起。

当时，我们约请了四位曾担任过原上海县、原闵行区和“撤二建一”后的闵行区文化局局长，通过他们的口述实录，全面反映数十年来闵行区在文化方面，包括群文、图书、广播电视、文博非遗等的发展情况，展示一个历史时期闵行群文人的筚路蓝缕、风雨兼程。这几位老局长在闵行文化系统几乎工作了一辈子，他们是闵行文化事业发展的参与者、亲历者和见证人，也是一个时期闵行群文人的代表和缩影。

回首往事，在很长一段时期里，群文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，且不说场馆设施简陋，创作条件艰苦，连基本的经费保障也捉襟见肘，远远满足不了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文化需求。虽然如此，一代又一代群文人始终不气馁，不放弃，他们白手起家，积极作为，通过数十年来的艰辛努力，迎来了闵行文化事业的春天。2014年12月，闵行区被国家文化部授予“全国先进文化区”的荣誉称号。

闵行文化历史悠久，独具特色。这里既有红色文化历史资源的基因，又有江南地区传统文化的积淀，更有兼容大气海派文化的创新。近年来，闵行区对标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新期待，对照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指标体系，定位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的新使命，明确群文改革再出发的新担当，不断丰富、策划、举办形式多样、特色鲜明、喜闻乐见、品质优良的文化活动，倾听民意、汇集民智，升级文化品牌，布局文化阵地，激发人民群众的创新创造活力；做实文化配送，提升服务效能，努力实现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，均等化发展，聚焦打通公共文化服务“最后一公里”，促进各方资源有效整合，不断扩大均衡共享，让市民参

与度更高，大众获得感更强。同时加强文化队伍建设，提高服务效能，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系统，不断提升市民素养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。

《老局长档案》可以看作是闵行文化河床的底部岩层，纵使河流本身是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，但它依旧留下了闵行每个阶段的文化发展印记：有成果展示，也有反思检讨，还有社会各界、新闻媒体的报道评价。不一定说全面、充分，但见微知著，作为总结和回顾，或亦有参考的价值。

“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”。我们相信，植根于千年文化沃土的闵行文化事业，将会在新时代掀开新的篇章，再出发，再超越。

● 口述实录

唐玉书：要让群众在精神上“吃饱穿暖” / 003

张渊：本土的才更有生命力 / 007

胡正宏：需求是最大的推动力 / 012

郁贤镜：经济是粮草 品牌是生命 / 018

● 史料辑存

一、概述 / 027

二、文化行政机构与管理 / 033

三、广播电视 / 037

四、群众文艺 / 041

五、公共图书借阅 / 049

六、文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/ 051

七、文化市场与产业 / 057

● 报刊文萃

春风化酥雨 ▾

整合社区文化资源 打造社区文化品牌 / 063

熠熠生辉的闵行合唱艺术 / 065

闵行：打造上海文化“新引擎” / 070

许浦：不拆违，哪来大戏台 / 077



架多元参与之桥 破广场舞扰民难题 / 082

市民舞台“幕后”的精彩故事 / 086

合力促进广场舞健康有序发展 / 091

报刊文萃

品牌溢馨香 ▼

唱响全城 / 094

为和平而歌唱 / 096

放歌新时代，市民合唱美好新生活 / 099

以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承发展沪剧 / 104

舞动“金”夜 我是主角 / 107

以“糕”的名义 / 109

报刊文萃

百花春满园 ▼

上海广场舞大妈上春晚 / 114

上海闵行区：广场舞跳进了剧院 / 116

舞进“殿堂” 舞向“两岸” / 119

音乐原创京歌《中国梦》获好评 / 121

捷克刮起“中国风” / 123

闵行文化交流在日受追捧 / 129

报刊文萃

润物细无声 ▼

张充仁纪念馆筹建前后 / 132

依托数字电影 为民办好实事 / 139



我看文化客堂间 / 143

昼夜书香飘逸“城市书房” / 145

《城市季风》：一本闵行人的自己的杂志 / 148

● 报刊文萃

旧俗展新风 ▼

文化越今古 粽情召稼楼 / 150

元宵处处春意闹 / 153

聚古镇之美 展文化之魅 / 158

太阳生活聚人气 极富魅力蕴文化 / 161

非遗保护传承的按需之路 / 168

● 文化大事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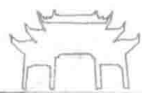
文化大事记 / 173



口述实录

K O U S H U S H I L U

这是一组老文化局长的口述实录。唐玉书、张渊、胡正宏、郝贤镜，是闵行（上海县）文化发展的见证者和实践者，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，将近50年，筚路蓝缕，薪火相传，书写风流。



要让群众 在精神上“吃饱穿暖”

唐玉书



唐玉书：群众文化是融在我们生活里的，必不可少。所以群众文化工作和吃饭一样重要，我们要让群众在精神上“吃饱穿暖”。

我从事文化工作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。那个年代，群众文化就像吃饭一样重要，因为重要，我们的热情被空前点燃。

1958年，我作为下放干部来到了诸翟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秦家桥生产队，这一年，正好是全国大搞大跃进运动。当时我们城市下放干部的使



命，就是要和农民一起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，包括精神面貌。

当时，我在诸翟担任宣传委员，1958年9月，上海县群众文艺创作运动兴起，墙头诗画非常热门。我们的工作就是用彩色颜料在农村墙头、生产队的仓库及食堂墙壁上作画，当时的口号还有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”“共产主义就在明天”等，提出“人人唱、人人写、人人画、人人跳”，记得当时我为了画墙头画，三天三夜都不睡觉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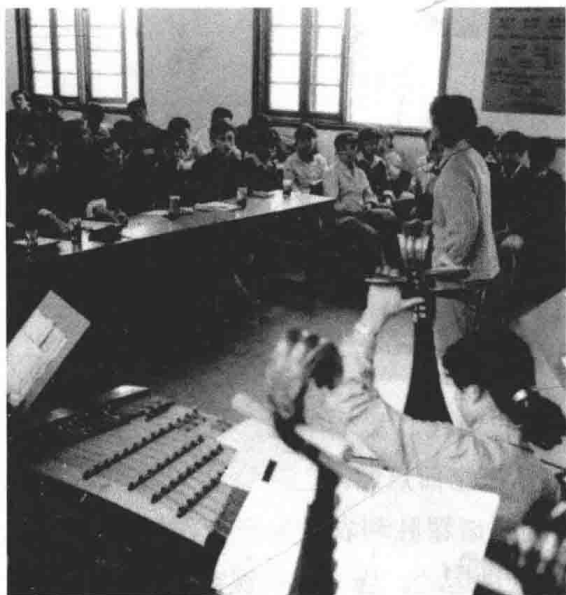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这样的干劲没有保持多久，1959年到1961年，中国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，上海县的文化工作也同时陷入了低谷。1960年中央召开会议，整顿人民公社，批判浮夸风、平均主义。1961年中央提出，文化工作要为经济让道停车，几个公社的文化站工作都暂时停了下来，干部们都去参加劳动，支援农业。

1962年，我调到了上海县文化馆文化科。这时各个公社文化站活动开始恢复，部分公社恢复成立业余文艺演出队，群众对文化的需求经过前两年的压抑一下子决堤了。但是群众文化工作却面临着经费严重不足的局面。经费的缺乏，也让人心极不稳定。没有钱，怎么办？当时，组织上提出，除了卖票组织演出外，文化站要创造非商品性收入。所谓非商品性收入，就是让我们清理仓库，把仓库里的东西拿到自由市场去卖，我记得我们文化馆当时有三个照相机，都是徕卡的，我们拿出去卖了个高价，当时解决了一部分经费问题。

为解决文化站的生存问题，我们提出每个月都要有一次演出活动，没有剧场怎么办，我们就把莘庄公社

1982年5月21日，上海县首届文艺骨干培训班在新泾原西郊文化馆内举行结业典礼。

前排左二为唐玉书局长（顾福根 摄）





的大礼堂租借下来搞演出。我们文化馆卖票，收入和礼堂分成，碰到市区有剧团下来演出，我们就“挤”进去，帮他们到公社去做媒介，介绍演出，同时会有一些提成收入。文化馆也经常组织活动，白天评弹团来演出，我们就帮着泡茶，送热毛巾，打些下手，收入分成。

经费问题暂时得到缓解，接下来是如何满足群众对文化的强烈需求。这种需求逼着我们改变工作方式，把文化送到田间地头，村落乡宅。60年代初，电视机绝对是一个新鲜事物，整个县没几部电视机，于是有电视机的文化站负责人就挑着担子把电视机送到各个大队，组织群众观看。我记得当时我们卖的是三分钱一张票，每晚去看电视的人把房间都挤破了。

1963年，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我们就组织专人到田间地头去给群众讲《红岩》《青春之歌》等革命故事。大唱革命歌曲在那个时候是最厉害的，当时莘庄有一个工厂组织的青年合唱团，我记得有一家漕河泾的厂合唱团与他们对歌，很有意思。他们大概引吭高歌了数十首歌曲，整整对歌2个多小时，都到了忘我的境界。那时候基本上做到了队队有歌声，每到晚上，各个村落旁都会传来阵阵歌声。我记得陈行公社的郁宋大队、曹行公社的曙光大队等歌队的演唱水准很高。

1964年，小型文艺宣传队成立之风兴起。我们当时是学习内蒙古乌兰牧骑的经验，各个大队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小型文艺宣传队，一般十来个人，演出内容基本都是由我们县文化馆提供的演唱材料。我们县文化馆为配合各个公社文艺宣传队的成立，经常派人下公社培养艺术人才，我们办学习班是没有收入的，还要造预算，贴工分，学员的吃饭睡觉都是我们包下来的。我们当时还自己动手做土幻灯机，给每个公社送去。除了送宣传工具下公社，我们还送辅导、送创作演出材料，各个公社派能创作的人过来培训，公社小型宣传队演出的内容就是这样产生的。

1966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。我当时被靠了边，成了批斗的对象。在这段时间，图书停借、电影停映、县剧团解散，百花齐放的群众文化一下子只剩下八部样板戏。直到粉碎“四人帮”，群众文化才又有了生命力。

这几年的群众文化工作经历让我体会最深的就是：群众文化是融在



我们生活里的，必不可少，所以群众文化工作也一定要贴近群众需求，能让群众在精神上“吃饱穿暖”。

文化工作 简历 >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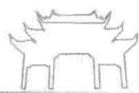
1950年3月，任职沪西工人办事处，筹办成立沪西工人俱乐部。

1954年，任沪西工人俱乐部主任。

1962年，调到上海县文化馆任馆长，主抓群众文化。

1980年，任上海县文化局局长，主抓各乡镇文化中心建设。

1986年，退休。



本土的才更有生命力

张渊



张渊：群众文化是什么？我认为就是扎根于这块土壤、来自老百姓日常生活、传承当地历史传统、鲜活的、触手可及的东西。本土的才更有生命力。

1974年，我来到当时的上海县文教局，负责群众文化工作。70年代初，上海郊区的文化建设可以用简陋来形容。当时国家规定每个乡镇都要成立文化站，名义上是文化站，却非常简陋。没有资金也没有编制，有的



文化站小得可怜，就一个干部，一间小房子，顶多还有一个房间给你打打乒乓或者康乐球。

文化几乎一穷二白，但群众却有迫切的需求。老百姓需要文化生活，特别要看戏，当时在市区有文艺剧团的演出，县一级的还没有设立剧团。当时人们看



鲁汇文化站文艺小分队，下乡到田头宣传（王荣涛 摄）

戏的劲头真是很热烈，像浦东三林、陈行地区的老百姓特别喜欢看戏，他们晚上会跑到上海市区去排队买票，看完戏以后就回不来了，摆渡轮也没有了，他们情愿在上海游荡一晚上，然后第二天接着买票看戏。

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当时各个乡群众开始自发性地组织起来自娱自乐，演一些小戏，像《碧落黄泉》《借黄糠》等折子戏在当时广为传唱，但是依然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。

百姓文化生活需求的高涨，促使农村基层文化中心的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。但是，80年代初，百废待兴，发展经济仍是最主要的任务。我们那个时候是要到各个乡镇去做动员工作，但当时乡领导也很为难，说经费有限，没有钱，老百姓要先吃饭。

吃饭重要还是唱戏要紧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。当时的乡镇毕竟存在着资金上的困难，靠自上而下的拨款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，于是，各个乡镇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文艺工厂来解燃眉之急。

所谓文艺工厂，就是把农村的文艺骨干集中在一起，搞个小工厂，正好那个时候农村加工业刚刚起步，借这个机会，我们让每个乡的领导给我们文化站搞一点好产品，我们文化站的干部还自己出去拉产品，这样就基本形成每一个文化中心都有了一个小工厂。

磨糠搓绳起头难。当时各个乡镇进行文艺工厂试点工作时也遇到了



不少困难，主要是思想上很难统一。不少同志认为“文化站干部搞文还可以，搞工不行”。有的认为办文艺工厂是向公社企业分“鸡腿”。还有就是厂房设备难解决，大多数公社房子紧张，文化站一无房子二无设备。再者产、供、销难落实，文艺宣传队人手少、缺技术等。但是，办法总比困难多，我们当时的很多文化站就把旧房子当厂房，把乒乓球桌当工作台，叮叮当当有声有色地干了起来……

有了小工厂，更有利于这些骨干的集中。他们除了上班外就聚在一起搞活动，文艺工厂赚的钱可以补贴这些人的“工分”，发一点奖金，买点器材。

在文艺工厂助力下，文化中心建设在上海郊区逐步推广，到1992年为止，全县19个乡镇除了莘庄乡要合并没有建立外，其余18个乡全部建成了文化中心。

乡镇文化中心建立以后，文艺活动可谓如火如荼。我们以文化中心这个阵地为依托，开展了多样性的文艺活动，县里也成立了相关社团，比如摄影协会、美术协会等五六个协会，辅导带领农村的文化活动，与农村文化挂起钩来，当时上海县的文化社区活动开始逐步形成一个网络，我们每年要做一次全县的文艺汇演，把农村好的节目集中到县里来，然后从中评选出一、二、三等奖，优秀的节目还会送往市里，送到北京，这段时间的文艺活动相当繁荣。

我们每个文艺队伍也都狠抓创作。当时上海郊县群众编排的小戏是



江南丝竹乐队在行街表演（顾福根 摄）

很有质量的，每一年都会产生十几个小戏，在市里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农村文艺汇演中，我们的节目是经常得奖的，当时郊区的小戏数我们上海县最出名。我们的文艺演出可谓遍地开